

突发性事件中新闻控制对新闻报道的影响

— 以《大公报》《申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为例

陈雨璇*

目录

- 一、序言
- 二、样本选择
- 三、历史背景
- 四、“西安事变”中新闻控制对新闻报道的影响
- 五、总结

一、序言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毛泽东称其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周恩来称之为“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蒋介石谓之“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转祸为福之道也”。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不断，无论是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过程、影响，还是对事变中的历史人物、国内外各种力量的作用与影响，都有诸多创新性研究。李义彬《西安事变史话》¹⁾一书主要介绍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等内容，涉及西安事变爆发的背景、经过、结果等方面。李立《亲历西安事变》²⁾一书通过亲历者口述历

* 中国阜阳师范学院 讲师，韩国又松大学校 Hotel观光经营学科 副教授。

1) 李义彬，《西安事变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史，真实还原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宋连生《蒋介石与西安事变》³⁾一书利用近年来大量披露的历史档案，翔实地记述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特殊经历及其态度变化。杨瀚《杨虎城与西安事变》⁴⁾是杨虎城之孙杨瀚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此书，记述了杨虎城为了促进团结抗日实现民主首倡“兵谏”捉蒋而因之丧失军队、惨遭杀戮的悲壮人生。还有英国记者J.M. 贝特兰《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西安事变》⁵⁾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叙述了自己在亲赴西安、探寻事变真相的所见所闻，真实、生动地记载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并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情况，客观地分析了事变的深刻原因和深远意义。此外学术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性论文则是大多涉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事变期间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活动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人物等。代表作有申东允《从国共两党关系的转变看西安事变》⁶⁾、黄道炫《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⁷⁾、张翼《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新论》⁸⁾、夏蓉《社会舆情与应变策略—以西安事变为中心的再考察》⁹⁾、何扬鸣《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¹⁰⁾等。

“西安事变”作为一次突发的政治事件，涉及到不同的利益团体、党派和国家，牵动了各方的神经。一方面，为了政权的稳定，国民政府自然对新闻媒体加以控制，力图影响当时的舆论倾向，从而影响民众对此次突发事件的态度、立场，进而达到降低此事件的危害性，稳定民心。除此之外，面对突发性事件不同媒体所有者的立场自然也影响自家媒体对于事件的剪裁、立场、措辞，从而保证媒体自身的利益、社会责任。作为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份民办报纸，

- 2) 李立, 《亲历西安事变》,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
- 3) 宋连生,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8.
- 4) 杨瀚,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
- 5) (英) J.M. 贝特兰, 《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西安事变》, 林淡秋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0.
- 6) 黄道炫, <西安事变: 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 《历史教学》第4期, 2004.
- 7) 申东允, <从国共两党关系的转变看西安事变>, 《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 2001.
- 8) 张翼,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新论>,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001.
- 9) 夏蓉, <社会舆情与应变策略—以西安事变为中心的再考察>, 《学术研究》第10期, 2007.
- 10) 何扬鸣, <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2008.

《大公报》和《申报》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便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及时披露事变的信息，使“西安事变”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同时还积极进行舆论导向，两份报纸皆大力宣传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功不可没。另外，这两份报纸之所以始终受到学术界尤其是新闻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追捧。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因其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史料价值丰厚，从对《大公报》和《申报》的研究中不仅可以了解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脉络，还可窥探整个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尤其是天津、上海这两个地区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但目前为止，对这两份报纸的新闻理念、舆论导向、宣传策略以及报纸所反映的某一社会问题或现象进行深层次对比探析，或者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报道所隐射出的某一核心问题进行评析探索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因此本文将通过《大公报》、《申报》两份报纸对“西安事变”报道的比较，来揭示在突发性政治事件中新闻控制对新闻报道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新闻控制之下媒体如何在政府和读者间寻找平衡点，较好的发挥媒介职能的作用。

二、 样本选择

1) 《大公报》

《大公报》是我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由英敛之1902年创刊于天津，至今仍在香港刊行，是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1941年，《大公报》成为第一份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授予荣誉奖的亚洲报纸。1980年更是成为联合国推荐的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三大报纸之一¹¹⁾。学术界关于它的研究成果丰厚，视角多元，逐渐客观深入。本文在这里做个简单集纳：

首先，整体式回顾性的研究。代表作有：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曹

11) 孫姣,〈近十年來國內《大公報》研究綜述〉,《傳承》,2010,11期,P84.

谷冰、王芸生《英欽之时期的旧〈大公报〉》、王芝琛、刘自立《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周雨《大公报史》、朱立平《英欽之与天津〈大公报〉》、陆万胜《评旧〈大公报〉》等。其中以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曹谷冰、王芸生《英欽之时期的旧〈大公报〉》这两篇最为突出。在内容上，两篇论着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大公报》进行了整体把握，力图做到全面、完整的再现当时的《大公报》。因此，对《大公报》的创办过程、以及对《大公报》的历史定位、《大公报》敢言、重视女子教育特色等内容无一例外的成为文章的组成部分，内容详实、表述清楚。但是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在写作过程中是由点到面，侧重于对《大公报》的新闻思想、经营特色、版面构成等内容的介绍，具有系统性；曹谷冰、王芸生《英欽之时期的旧〈大公报〉》的写作是层层递进式的展现当时《大公报》的整个运作过程，侧重于对办报过程的评点，具有批判性。在资料的使用上，两篇论着都利用了第一手资料以及自身优势，向读者较为丰富的《大公报》。方汉奇是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是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他的研究有着充分的史料储备，因而对材料的选择游刃有余，但是因过于急于给《大公报》“翻案”，因此在对源材料选择上有些明显的留下是据需要进行取舍的痕迹；曹谷冰、王芸生是《大公报》的亲历者，文章写作中的资料使用更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成为后人编写《大公报》史的基础，但被抹上了浓重的时代印记，文中随处可见大公报人的自我讨伐之辞。在对报纸的性质定位上，都受政治学的影响较重，对报纸的研究习惯于“阶级”定位，都或多或少的带着“革命”式的“解释框架”。方汉奇认为，“在政治倾向上，《大公报》属于‘中间势力的报纸’。这个‘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个中”，“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曹谷冰、王芸生的认定是“英欽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是由一个受天主教教养的具有保皇立宪思想的满洲旗人，利用天主教和法帝国主义的势力和一部分金钱，以及买办资产阶级等的投资办起来的一家报馆。这可说是一个以满族保皇派和天主教为主体，结合法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等的混合物”。“革命范式”在阐释中国新闻史的历史沿革中虽

然的确抓住了本质，然而单纯以阶级划分来评价报刊、新闻人物则又未免简单化，而发展到极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¹²⁾。

其此，对《大公报》的业务、经营特色的研究。代表作有何炳然《辛亥革命前〈大公报〉的评论研究》、赵明《早期〈大公报〉的爱国主义思想》、王鹏《〈大公报〉的资金与股份变动情况》等。如何炳然《辛亥革命前〈大公报〉的评论研究》一文对辛亥革命前（1902年至1911年）英敛之创办时期的《大公报》的评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文章不仅详实的展现了这一时期的评论特色，而且还与现今的报刊评论相比较，突出当时评论的特点以及现实借鉴意义。另外通过对《大公报》中广告的分析与解读来透视观察近代中国生活的研究也较为丰富，主要有孙会《〈大公报〉中的另类社会广告与近代中国社会》《传播中的折射——从晚清〈大公报〉广告透视天津社会生活》以及胡婷《冲突与融合：20世纪早期湖南交通方式的变迁——1917- 1927 年湖南〈大公报〉广告解读》。

第三，对《大公报》与女性关系等社会问题的关注。代表作有李吉莲《〈大公报〉与清末妇女解放》、毕新伟《惊鸿一瞥——〈大公报〉（1902-1912）与女权》、姜乐军《〈大公报〉与清季反缠足运动》、方豪《英敛之笔下的吕碧城四姐妹》、葛凤《〈大公报〉与近代灾荒救济》，冯玉龙《〈大公报〉与近代中国体育研究》和廖芳芳《〈大公报〉视野下的 1945 年的中苏谈判》以及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等。其中在《〈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一文中，侯杰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大公报》进行研究，以展示近代中国社会的嬗变，而且从一个相对广阔的领域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文章依照“放足”——“文明婚姻”——“兴女学”的顺序，对“个人”——“家庭私人空间”——“社会公共空间”等层面上的开女智与女性身体解放等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不仅勾勒出近代妇女解放过程中从反对缠足、解放女性的身体，到推动实行新式婚礼、提倡婚姻自主、在妇女生活的私人空间中解放女性的心灵，再到鼓吹发展女子教育和新式女子学校，使解放的妇女步

12) 孫姣, 〈近十年來國內《大公報》研究綜述〉, . . 《傳承》, 2010, 11期, P84.

入社会等不同层面的渐进式演进过程，而且可以看出新兴于近代的报纸媒体如何以自身特点和力量推动妇女的解放。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作者的构想是以重新认识晚清社会为依托，借助于近代新兴的报刊媒体，获得更实在的印证。夏晓虹认为报刊之深切影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其形构的公共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维、言谈、写作定势以及交流方式，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晚清报界主体的民办报刊所代表的公共立场，也注定了其向民间社会倾斜的取向，并为之留下了相当忠实且详尽的记录。

2) 《申报》

《申报》是中国近代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经营规模最为完善的一家报纸，经历了中国近代史的大部和现代史的全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在近现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史料价值相当丰富，学术界对其研究兴趣浓厚。近些年国内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申报》刊载的内容为研究对象。《申报》的内容研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新闻与广告。研究者都对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新闻方面，对《申报》报道某一历史事件或者审视某一群体形象的研究成果丰厚。在这里《申报》成为“历史事件的记录者”，显现了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最为突出的两则案例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和“杨月楼案”¹³⁾。学者滕瀚从舆论监督的角度出发，“以中国近代大报《申报》对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为例加以分析，通过近代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道路上的勇敢探索，探寻其对当今新闻报道的启示¹⁴⁾。”也有学者通过梳理《申报》“杨月楼案”的报道过程，发现“《申报》的新闻报道因为能够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明确报纸的定位、善加引导社会舆论、积极探索新闻业务，才会使得‘杨月楼案’

13) 李勇軍, 〈試論晚清新聞媒体的社會輿論作用——以《申報》關於“楊乃武案的報道爲例〉,《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2008, 2期, P57-P60.

14) 滕瀚, 〈近代新聞媒介輿論監督的啓示——以《申報》報道的“楊乃武与小白菜案”爲例〉,《新聞世界》, 2012, 7期, P240-241.

的报道形成巨大的舆论影响，赢得良好的民间口碑，提升报纸的民间形象¹⁵⁾。”并据此提出这些报道经验对于现代媒体的借鉴作用¹⁶⁾。

除此之外有学者研究《申报》对抗战期间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报道，对1927年南京事件的报道，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对济南事件的报道，对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援台抗法的报道，有学者关注对1936年中国柏林奥运行的报道，对历史上最早的亚运会的报道，甚至其77年来有关体育运动的报道等，研究的内容更加趋向于多元化¹⁷⁾。

在广告方面，学者均认为广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不小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申报》的广告特色，注重版面设计和对文字的编排、线条的使用¹⁸⁾。还有学者选取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段新旧思想碰撞交汇的特殊时期《申报》的广告，结合历史背景，从社会性别理论角度对《申报》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做分析，呈现出《申报》广告所勾勒出的女性形象和体现出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以期为报纸广告史和女性主义传播方面研究提供借鉴¹⁹⁾。也有学者从历史学角度出发，以民国双十节的广告投放为研究对象，探讨广告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还有学者选择一段时期的《申报》作为研究的样本，探讨20世纪30年代《申报》美容、化妆品广告所展示的审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探讨“广告是如何来构建审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²⁰⁾。从以上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申报》中的广告研究已经自成体系，内容丰富，并且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梳理对于《申报》广告内容研究的综述，如学者李伟的《2009年至2011年国内〈申报〉广告研究综述》和吴宛青、陈靓的《〈申报〉广告研究综述》等²¹⁾。

其次，以《申报》自身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办报理念、业务革新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这一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对《申报》进行研究主流。有学者从传统理论

15) 馬薇薇, <《申報》“楊月樓案”報道研究>, 《浙江傳媒學院學報》, 2009, 1期, P43-45.

16) 張雅, <2008-2012年國內關於《申報》的研究綜述>, 《新聞世界》, 2013, 8期, P240.

17) 王書川, 徐霞, <2007年-2012年《申報》研究綜述>《新聞世界》, 2013, 7期, P262-P263.

18) 屈慧君, <《申報》分類廣告的啓示>, 《中國商界》, 2010, 7期, P397-P398.

19) 王楠, <《申報》廣告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讀>, 《新聞知識》, 2011, 12期, P84-85.

20) 張雅, <2008-2012年國內關於《申報》的研究綜述>, 《新聞世界》, 2013, 8期, P241.

21) 疏宜菲, 程瑛婷, <2008-2014年《申報》研究綜述>, 《新聞世界》, 2015, 3期, P101.

研究的视角出发, 论述了《申报》对历史事件的报道间接地反映了《申报》的办报理念及舆论导向²²⁾。另外通过对灾荒报道分析探讨《申报》在灾荒报道中所体现的民生关怀意识²³⁾, 及该意识与当今民生新闻的联系, 试图为当今媒体应对灾荒或社会危机、更好地表现民生关怀意识提供一定借鉴²⁴⁾。有的学者以《申报》在五卅运动中的实践为例来探析它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 还有学者对《申报》进行媒介生态分析。当然关于《申报》本身细节的研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 如报纸与读者的互动、广告、宣传、报纸对新闻内容的选择、媒介形象、自我宣传、报纸中教育新闻的特点、编辑手法、业务革新、报纸的政治参与、社会新闻报道的演进、社评、报人心态等, 部分研究《申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²⁵⁾。

第三, 对《申报》经营管理的研究, 学者的认识大致相似, 通过分析其成功经营策略, 从而为当代中国报业经营管理探索一条好出路。关于《申报》经营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历史角度对于《申报》经营策略和特色的研究, 如张金凤《〈申报〉初期的经营致胜之道》等; 二是结合《申报》经营管理, 对于当代报纸乃至大众传媒的指导和启示方面的研究, 如王海涛《从史量才时期的〈申报〉看当今报业》²⁶⁾。史量才时期的《申报》经营管理策略研究是目前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阶段, 研究者们对史量才时期《申报》经营环境、报纸的产品经营、广告和发行经营、科学管理以及多元经营等进行了多方位研究, 其中以于鑫《史量才主持时期〈申报〉经营管理研究》研究最为全面。

这两份报纸始终受到学术界尤其是新闻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追捧。究其原因, 最重要的是因其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史料价值丰厚, 从对《大公报》和《申报》的研究中不仅可以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近代报业的

22) 王學珍, 〈清末報律頒布前后的報界反應〉, 《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008, 6期, P90-P97

23) 張玫, 鄭金彪, 〈1907、1907年的安徽水災及其救治—以《申報》和《大公报》所載資料為中心〉, 《傳奇·傳記文學選刊》, 2010, 5期, P68-69.

24) 王書川, 徐霞, 〈2007年-2012年《申報》研究綜述〉, 《新聞世界》, 2013, 7期, P264.

25) 疏宜菲, 程瑛婷, 〈2008-2014年《申報》研究綜述〉, 《新聞世界》, 2015, 3期, P102.

26) 張亞敏, 程蕾, 〈關於《申報》經營的研究綜述〉, 《新聞世界》, 2014, 7期, P262.

发展，还可窥探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天津、上海这两个地区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但目前为止，对报纸的新闻理念、舆论导向、宣传策略以及报纸所反映的某一社会问题或现象进行深层次对比探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报道所隐射出的某一核心问题进行评析探索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

《申报》和《大公报》是我国二十世纪私营报业的代表，处于相同的时代背景下，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各自的报道重点是不同的，这是受到各自的新闻理念、以及报纸管理者的政治立场、以及地理位置和办报技术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一个是“文人的讲坛”，一个是商业报纸的典型。两种不同类型的报纸都是当时中国的现实语境的产物²⁷⁾。“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有影响的一次突发性政治事件，当时的媒体在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上采取了不同的传播内容选择及传播方式运用。本文试图通过当时《大公报》、《申报》两份报纸对此事件报道的比较，来揭示在突发性政治事件中新闻控制对新闻报道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新闻控制之下媒体如何在政府和读者间寻找平衡点，较好的发挥媒介职能的作用。

三、 历史背景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日本的野心和举动对欧美各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态度日趋强硬。同时英美等国也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借以同日本角逐并获取利益。同时，当时国内的国共两党也在进行着内战。在这种复杂背景下“西安事变”爆发了。

突发事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发生的突然性，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一段时间

27) 余迎, 刘文君, <《申报》《大公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比较>, 《新闻世界》, 2011, 7期, P147-148.

内会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焦点。突发事件特别是重大事件，会影响到政治、经济、人民生活等的方方面面，会冲击公众的心理，会影响到国家的内政外交，突发事件经常会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西安事变”作为一次突发的政治事件，牵动了各方的神经。由于许多深层次和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比如连绵不断的各种内战、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使得“西安事变”涉及到不同的利益团体、党派和国家。一方面，为了政权的稳定，国民政府自然对新闻媒体加以控制，力图影响当时的舆论倾向，从而影响民众对突发事件的态度、立场，进而达到降低突发事件的危害性，稳定民心。除此之外，面对突发性事件不同媒体所有者的立场自然也影响自家媒体对于事件的剪裁、立场、措辞，从而保证媒体自身的利益、社会责任。

《大公报》和《申报》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便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及时披露事变的信息，使“西安事变”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同时还积极进行舆论导向，两份报纸皆大力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功不可没。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西安事件”爆发，到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此事件历时两周基本结束。两份报纸都是从12月13日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到12月30日左右结束，但考虑到研究的工作量以及由于25日以后基本是关于事件的善后处理和抗日，笔者在此不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故笔者在此处抽样的时段为1936年12月13日到12月25日共13天的报道（13日和25日包括在内）。

四、“西安事变”中新闻控制对新闻报道的影响

新闻控制的控制方来自许多方面，政府，媒体所有者，利益集团等等，不同的控制源都会对新闻报道产生不同的影响。

1) 行政控制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清晨6时，张学良和杨虎城（此后将用张杨替代）让秘书草拟发动事变对时局的宣言。但掌握电台的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背叛张杨，故意迟发宣言，并向何应钦通风报信。南京政府得知西安发生变故，便即刻下令对西安进行新闻封锁。随后，来自西安的报纸被检查官烧了，强有力的中央广播电台对县广播电台进行震耳的干扰，国统区各报被禁止刊登张杨的8项主张、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文章及塔斯社的电讯。一切新闻报道皆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一切对外通讯皆“瘫痪”。《大公报》的编辑受到了警告，不准刊登来自西安的消息，否则就要被捕；连美国记者斯诺都不准报道张杨的8项主张，承发的电讯被肆意删减。

对于当时的新闻状况，有两个人曾经做过评述。一是宋美龄，她描述道：“盖此时之西安，就新闻观点言，已成死城矣，有线电报交通皆以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到正确消息，然烂语浮言，已传播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心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标题。”另一个是埃德加·斯诺，他的描述是：“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竭力扣压真正的消息和事实，另一方面却向全世界发出一些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像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可见当时新闻控制之严厉。

《大公报》和《申报》是当时国统区影响力巨大的报纸，自然也受到了这一新闻政策的影响。从两份报纸在报道时的报道自由、所涉及的主题、报道的立场等方面可见一斑。

(1) 报道自由

在西安事变爆发的一开始，国民政府便封锁信息，《大公报》的编辑不准刊登来自西安的消息，否则就要被捕。12月13日，《申报》在显着位置发表了涉及事变真相的重要新闻：“据闻此次兵变之近因，系由于某军队有通共嫌疑之

重最大的。

《申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共有254条，消息共251条，评论共3条。其报道主题亦集中在五个方面，67%集中于事件的进展和政府的应对、国民党官员和地方实力派的应对两方面，其中事件的进展和政府的应对占到了36%。

由此对比可以看出：

①两份报纸对于“西安事变”的报道，所涉及的主题基本一致，且两份报纸都用了65%左右的报道量来讲述有关事件的进展和政府的反应、国民党官员和地方势力派的反应，这些皆可理解为国民党的声音，其他各界虽有涉及，但是所占比例较少。

②其中所涉及报道主题来看，两份报纸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并不全面。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曾于其间积极斡旋，并发表通电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态度，中共的态度和做法对后来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两份报纸对此均只字未提，这自然不是疏忽所致。此外，张杨在事变的第二天就发出对时局的通电，陈述事变的原委与自己的主张，但此处我们看到，两份报纸均未提及张杨二人的主张。

(3) 报道立场

“西安事变”之后，《大公报》连发4篇社评，为营救蒋介石而大声疾呼。随后，《大公报》的言论接连不断，内容多为拥蒋反共批张杨。而当时的《申报》虽然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尽量避免“评论”的方式，但该报通过对事实的选择，也呈现了和《大公报》如出一辙的态度和立场。考虑到研究的方便，笔者在此处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报道来说明。

①《大公报》

12月13日的《大公报》国内要闻版在《张学良竟率部叛变 蒋委员长被留西安》这一标题下，采用了“中央社南京十二日电”报道了西安事变的发生，称张学良叛变，发出通电主张推翻政府，它还刊登了一则“民国政府十二日令”，称

张学良叛国殊堪痛恨，应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办。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西安事变”进行讨伐，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何借机向潼关进发，并对西安进行轰炸。《大公报》在社评《讨伐令下之后》（17日）表示，此时刻全国人民唯有齐一心志祝叛乱速平，此外无讨论余地，希望在大军西进之际军事当局无令西安混乱，因为“该不特为二十万市民安危所关，且蒋委员长在蒙难中，更不能不特别重视此问题²⁸⁾。”而对于中央军飞机轰炸西安附近地区，伤及无辜百姓的消息却不见报道。该报在评论《祖国利益高于一切》（19日）表明：“中央讨伐令下了以后，国家等于在紧急戒备状态。关于陕变之记载言论，我们要受中宣部指挥，加倍慎用，所以凡类似调停疏解的言词，盖不可用²⁹⁾。”社评《张学良的叛国》（20日）一文中还提出“张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政府平叛乱是当然责任，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联合战线，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³⁰⁾。

12月18日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更是其中的典型，在张学良和东北军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封公开信是张季鸾写的，他根据东北军及其家属从关外退向关内的痛苦现实情况，抓住他们的心理希冀，写的声情并茂，颇有感染力。公开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是本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附和你们的……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的祸国，是便利外患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³¹⁾。”

②《申报》

12月14日刊登了各方人士对“西安事变”反应的报道。尽管各方民众因身份等不同，语气平缓有异，但总体而言一致要求张杨尽快释放蒋介石，谴责张杨扣

28) <討伐令下之后>，《大公報》，1936，12.17.

29) <祖國利益高于一切>，《大公報》，1936，12.19.

30) <張學良的叛國>，《大公報》，1936，12.20.

31) <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大公報》，1936，12.18.

押蒋介石的行为。比如，“中央研究院等七个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伐杨”，指责张学良“怙恶不悛、当国家统一之际，绥乱将平之时、竟包藏祸心、劫持统帅、动摇国本³²⁾。”该报在当日的评论也支持蒋介石对当时中国具有重要作用，“蒋委员长是我国最高的军事领袖，他的威信一向是全国军政的唯一重心。”他的“失却自由，这就是统一的中国重复趋于涣散的危险³³⁾。”

12月16日，该报披露了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李书华等人致张学良的电文，摘录如下：“西安张汉卿先生鉴，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遇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同时，该报还报道了全国各界对时局的宣言，摘录如下：“……吾人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之方针政策……”、“易辞言之，使我四万万胞自无组织而有组织。由无国而有国，出同胞于水火，登斯民于雅席，伊谁之力？曰，惟蒋公为民族之栋梁，为国家之领袖……”。

12月18日《申报》报道“京各团体拥护讨伐张”，京市、农、商、学、妇女等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拥护讨张政策³⁴⁾。

12月19日，“各方将领通电讨逆”。海员团体支持讨逆。尽管未有哪方民众对武力讨伐张杨提出异议，但直至23日，仍有很多人疾呼“迅速悔祸，自收轻罪、护送蒋公、脱离险境、人民可以宽恕既往³⁵⁾。”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公报》与《申报》在报道自由、报道主题、报道立场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行政力量的影响。在报道自由方面受到政府新闻检查的制约，“西安事变”真实的情况无法报道。报道主题更多涉及的是对国民政府的有利因素，控制有关中共在此次事件中的态度与做法的报道。报道立场则是与国民政府保持一致。

故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

32) <中央研究院等七个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伐杨>，《申报》，1936，12.14.

33) <中央研究院等七个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伐杨>，《申报》，1936，12.14.

34) <京各团体拥护讨伐张>，《申报》，1936，12.18.

35) <各方将领通电讨逆>，《申报》，1936，12.19.

的报道做了相应的管制，严格控制事变的相关真实信息的流出，这一方面是政府对于突发事件采取的处理措施，是在尽量避免事变扩大所产生的影响，避免事件影响的扩大化，另一方面报纸成为了国民政府官方的发声台，这种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社会舆论的影响，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非常重要的，有利于稳定民心。

2) 媒体所有者

在新闻控制中，媒体所有者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大公报》和《申报》其媒体所有者主要是报人，因报人立场观点的不同，同样性质的报纸也会有不同的办报方针，进而会有不同的报道体裁、措辞、新闻内容等。

《申报》在1872年4月30日由英商美查在上海创办，美查明确提出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为“谋利”，这也成为了《申报》一贯的经营方针。1912年史量才接办该报后，为避免在政争迭起的动荡政局中受到牵连而危及营业利润，报纸实行了不偏不倚、轻言论重新闻的编辑方针，针对重要的政治问题一般只报道，少评论或不评论。而《大公报》则恰恰与之相反，社评、新闻通讯、特写通讯和星期论文，是《大公报》的四大特色，其中张季鸾的社评尤为“出彩”。“文人论证”是该报的办报立场，以张季鸾为代表的报人们大多主张“文人论证”，同时在他们的骨子里还有浓厚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他们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声音来关心政治问题。于此同时，该报的报人们都是知识分子，且大多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对于他们而言有着自己无法突破的阶级局限性，他们都拥护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无法突破，且“公众、国家利益”是其主要观点。因此，在对西安事变的报道中，《大公报》和《申报》表现了明显的不同。笔者在此选择了一些典型报道来说明：

12月13日，《大公报》在国内要闻版，刊登了“西安事变”的相关事宜，但其只是采用了“中央社南京十二日电”。且尽管《大公报》称电讯不通，事情经过尚未完全明了，可是14日以后该报的国内新闻版几乎都是有关“西安事变”的报

道。它曾发表了孔祥熙、居正、冯玉祥等人的讲话，居正称张学良是纨绔子弟，前有失守疆土之罪，而今又犯上作乱，目的是要颠覆国民政府、打倒国民党。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将“西安事变”视为“政变”。冯玉祥则认为张学良糊涂，受人威胁，做出犯上之事。

在对民众反应的报道中，多使用愤慨、声讨、谩骂、恫吓等类的字眼，笔者在统计中发现，在14日到17日的报道中，有关这一态度的报道共有11条之多；而有关责难甚至谩骂的报道多达28条。标题如《宋韩等电何 对陕变甚为愤慨》、《各地愤慨奋起声讨》、《全国将领一致请缨》、《全国声讨叛逆 一致拥护政府 各界通电痛斥张学良》等，营造出全国一致反对的氛围。

12月16日，在国民党下达讨伐张扬之后，便发表评论，关于评论的详情情况，笔者在上文有关行政控制的影响中已做介绍，此处不再赘述。12月18日的评论中也表现出认为蒋介石是国家支柱，他的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等，“忠君爱国，国家利益至上”等观点体现明显。

而在相同的时间，《申报》报道则是不同的。12月13日，该报同样对“西安事变”进行了报道，共4条消息，头两条与《大公报》一样采用的是“中央社南京十二日电”，后两条则是路透社电，一条报道了蒋氏平安的消息，称事变原因是西北剿共军之一部分借此要求返东北效力；另一条则称兵变“有通共嫌疑”，“张氏此举是否出于主动，或被动尚不可知”，在提及通电时，竟用了20个“□”来代替，称内容是被新闻检查时删除的，但国民党一向是不允许对新闻检查删除之处留下空白的，但《申报》却没有按照规定，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让人联想到西安事变的爆发不是无缘无故的。而对于“讨伐令”，《申报》的时评只有《国府下令讨张》（17日）1篇，认为在外交风云异常紧张的情况下，政府讨伐是“不得不为之”，“吾人亦难不欲再为功罪之论列，唯有万众一心，镇静自处，拥护政府之方针”，并希望张学良能“悔过”，“无令亲者痛而仇者快，吾人所殷切默祷如是而已³⁶⁾。”

媒体所有者控制下的新闻报道，很大程度受到报人及报人所在报纸坚持的报

36) <國府下令討張>，《申報》，1936，12.17.

道方针的影响。《大公报》更多的是以评论见长，其中的态度情感更为明显。与之相比《申报》则显得较为“保守”，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两份报纸所一贯坚持的办报方针不同，并且报人的思想观念不同，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会对新闻报道产生影响。

五、总结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新闻控制对媒体的影响巨大，尤其是行政控制的影响。两份报纸有着不同的办报方针、宗旨，然而对于“西安事变”的报道上，两份报纸如出一辙，纷纷一致“拥蒋反共”，在主题方面的涉及几乎完全一致，都在传递国民政府的声音，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成为当时国统区的主要舆论倾向。两份报纸在当时的行政控制之下皆背离了自己的办报方针和立场，成为国民政府的传声筒。

不过我们也需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出发，如果当时没有这些新闻控制，此次突发事件会如何发展以及将造成怎样的影响？笔者认为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由于突发事件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不好的社会舆论效果，那么实际上此时政府的新闻控制就会显得很重要，媒体要等待政府的官方声音，传播官方的声音，这是在处理突发性事件，尤其是突发性政治事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不论是在当时的社会，还是退回到现在，这个控制的标准笔者认为都应该存在。

一份报纸能否做到公正、客观除了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外，其内部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两份报纸虽然都受到了新闻控制的影响，涉及主题的选择几乎完全一致，都在反应国民政府的声音，完全看不到共产党以及“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声音，对民众反应的报道也基本采取营造出民众皆是反对态度的氛围，失去了客观公正性。然而《申报》所受到的影响却没有《大公报》的程度深，一定程度上还是做到了客观公正。在上文的阐述中，我们可以

看到，这与报纸的办报方针以及报人思想是有很大关系的。

尽管两份报纸在舆论导向上一致倾向国民党，不够客观公正，但《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由于其个人的思想、学识等方面，在“西安事变”的报道中其是在明确阐明观点，大量运用评论，使得《大公报》的报道颇具深度。

《申报》在史量才接手后，虽然在政治控制下具有一些政治色彩，但其依然保持冷静，避免锋芒，很少直接发表意见，而是大量的进行消息报道。而且《申报》不像《大公报》在报道时只采用中央社的消息，而是大量运用了各地的报道，使报道呈现出多样的声音，比如在其13日的报道中，不仅引用中央社电，还引用了路透社电。同时注意对民众反应的报道，给予民众一定的话语权，体现其为民众考虑的一面。

对于当时严厉的新闻控制，报道能够找到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平衡点十分重要，当时的《大公报》虽也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但不太理想，从后人对该报当时表现的诟病即可看出。而《申报》尽管面临很大的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始终还在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有些许退让，但是仍进行分寸的把握，比如措辞冷静，减少评论的刊登，尽量只是披露事件的发展，同时使信息的来源多样化等。

总之，新闻自由只是相对的，总是会存在着新闻控制，在众多的新闻控制方式中政治控制的影响力最大、最深远。作为新闻媒体，在面对政治控制时，需要冷静理智的去寻找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平衡点，才能使媒体职能在限制之下最大限度的较好的发挥；于此同时作为媒体还需要对报纸进行准确定位，提高报人的思想境界和认识，才能让报纸更好的发展。

參考文獻

- 段彪瑞, 岳谦厚: 《媒体、社会与国家:〈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贾晓慧: 《‘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 侯杰: 《‘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 “大公报”香港馆, 《‘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 任桐: 《徘徊于民本与民生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 王芝琛: 《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 王芝琛: 《一代报人王芸生》, 成都: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 王润泽: 《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徐铸成: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 大公报: 〈一代报人胡政之〉, 2001- 12- 12.
- 李秀云: 《‘大公报’专刊研究》,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 方汉奇: 《大公报百年史》,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王芝琛, 刘自力: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2.
- 周雨: 《大公报史》,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曹谷冰, 王芸生: 《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60.
-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北京: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5.
-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罗苏文: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章辉美: 《社会在转型与社会问题》,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4.
- 夏晓虹: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夏晓虹: 《晚清社会与文化》,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滕瀚: 〈近代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的启示——以〈申报〉报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例〉, 《新闻世界》第7期, 2012.

- 马薇薇:〈‘申报’“杨月楼案”报道研究〉,《浙江传媒学院学报》第1期,2009.
- 李勇军:〈试论晚清新闻媒体的社会舆论作用——以‘申报’关于“杨乃武案”的报道为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2008.
- 陈朝祥:〈史量才的“史家办报”思想〉,《赤峰学院学报》第3期,2009.
- 金玲:〈1931—1934年的申报及其舆论影响〉,《新闻世界》第8期,2011.
- 王彤丹:〈‘申报’1906-1912中剪辫易服的舆论选择〉,《新闻传播》第6期,2014.
- 何莲:〈‘申报’里的早期上海电影(1896-1915年)〉,《新闻大学》第6期,2011.
- 梁严冰,董艳华:〈‘申报’报道的西安事变〉,《百年潮》第4期,2007.
- 杨璐玮:〈晚清家庭中的女性形象探析——以‘申报’及画报为中心的考察〉,《黑龙江史志》第8期,2009.
- 杜新艳:〈‘申报’的过渡时期〉,《汉语言文学研究》第2期,2011.
- 梁雪莱:〈‘申报’的媒介生态分析〉,《新闻世界》第8期,2011.
- 陈靓,吴宛青:〈2001-2011年国内‘申报’研究综述〉,《新闻世界》第8期,2011.
- 陈建生:〈新记大公报学术史述略〉,《求索》第3期,2004.
- 穆欣:〈‘大公报’拥蒋反共的阶级根源〉,《新闻爱好者》第1期,2002.
- 方汉奇:〈为‘大公报’——应该摘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新闻爱好者》第12期,2002.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News Control On The News Report In The Sudden Event
— In the “Dagongbao” and “Shenbao” reported on the “Xi’an incident” as an example

Chen, Yuxuan

The “Xi’an incident” is a sudden political event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news, the media at the time of report on the incident to take different ways to spread the content of choice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use of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he “Dagongbao” “Shenbao” two newspapers reported the incident, to reveal the political events in the sudden news control effect on news reports in the news media 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how to fin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readers,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functions of the media.

Key words : News control , 《ShenBao》 , 《DagongBao》 , the Xi’ an incident

투 고 일 : 2017. 10. 10. / 심 사 일 : 2017. 10. 15.~ 2017. 11.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7. 11. 20.